政治科學論叢／第 96 期／民國 112 年 6 月／頁 53-92

# 漢唐崛起對周邊的「衝突－回應」模式*

蘇軍瑋**

## 摘　要

漢朝與唐朝作爲中國歷史上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僅用不到數十年時間便使其帝國到達鼎盛，並與周邊維繫著穩定的宗藩關係，期間必然經歷各種衝突與危機，對手國包括甫崛起時面對的現狀霸權以及體系穩固後的周邊各國。本文透過檢視漢唐兩代與周邊衝突的回應策略出發，據以了解當一個大國（統一且強盛）面對來自周邊的挑戰時，大國如何抉擇回應方式以及動武規模，歸納出一個可資依循的大國「衝突－回應」決策路徑。

本文指出在漢唐崛起之初、權力轉移時期，作爲崛起國的漢唐並未對現狀霸權國做出更多挑戰，基本遵循守勢現實主義的預期以政權安全存續爲首要考量。另一方面，當漢唐帝國處於盛世時，其所建立的宗藩體系中一旦出現來自藩屬國的挑戰時，中原王朝會因對方並未恪守本分而施以最強烈的懲罰。此與儒家和平論中強調儒家文明圈內會相對和平的論述不盡相同，甚至儒家文明內部的衝突強度可能遠強於儒家與其他文明的衝突，突顯一旦出現衝突時中國對關係較親近者的強硬態度，並將朝貢體系理論與關係理論相互結合並加以衍伸，進而完善歷史中國的「衝突－回應」決策模式。

關鍵詞：關係、藩屬國、漢朝、唐朝、衝突處理模式

---

* DOI:10.6166/TJPS.202306_(96).0002

**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E-mail: junewei9@mail.ntpu.edu.tw。

收稿日期：111 年 3 月 21 日；通過日期：112 年 3 月 21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應中國崛起諸多理論文獻從不同理論視角探討中國將如何與現狀霸權以及周邊各國互動，足見此一議題堪稱現今國際關係論者關注的熱點。然而，中國作爲一個屹立數千年的國度，統一、崛起、壯大、稱霸，進而與周邊互動，在歷史上並非單一個案，秦、漢、隋、唐、宋、元、明、清這些或長或短的統一王朝的經驗，也足堪現今借鑑。將中國歷史與哲學思維應用至國際關係的相關研究，較爲著名的有中國大陸學界：秦亞青的關係理論與清華學派，以及臺灣學界：張啓雄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石之瑜等人的關係平衡理論以及逐步發展的歷史與國際關係理論的臺灣學派（張鋒，2012：125-156）。

本文焦點在於利用已整理完成的史料並從中抽繹出我們所需的資料，並以類型學的方式進行簡化，以便更簡易地了解在中國歷史上興起的統一王朝：漢與唐兩代面對來自周邊國家的挑戰的回應，特別是在漢唐崛起之初，受限於國力時面對挑戰的回應，以及國力鼎盛且面對來自周邊挑戰時，如何受到挑戰發起國與中原王朝親疏關係的影響，並根據相關史料透過歸納與比較，進而擬定一個「衝突－回應」決策路徑。

爲了探究這個議題，我們將所選定的歷史依照國力區分爲：漢朝與唐朝的新生時期（國力較弱）以及漢唐的盛世時期（國力較強）並作兩兩比對進而根據理論文獻擬定出兩個主要的假設，其中假設 1 是針對國力較弱時期的漢唐回應決策所擬定的，並進一步根據對手國的親疏遠近區分爲兩個小的假設，另一個假設便是聚焦在國力鼎盛時期的漢唐的衝突回應策略，同樣的也會依據對手國的親疏遠近不同做出兩個小的假設。

隨後檢視新生漢朝、盛世漢朝、新生唐朝以及盛世唐朝這四個時段的中國，當與其他國家發衝突時的起因、過程與中國面對衝突的處理方式，並透過將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對手國以「親疏遠近」[1] 爲分類標準，由遠而

[1] 在中文語境中如何判斷雙方是否「有關係」或「關係好」，則可觀察對方的歷史文化、透過自我制定的標準來判斷對方與自身是否同群（石之瑜，2020：12）。根據我們的研究，當漢唐中國在面對外在衝突時，會依據對手國與自身的「關係親疏遠近」來判斷應該如何因應。至於如何判斷對手國與漢唐中國的關係親疏遠近，本文採取的方法是觀察對手國的歷史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說，與石之瑜的判斷標準是一致的，同樣也是透過觀察對方的歷史文化之後來判斷雙方是否同屬一個群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近區分成「主要敵國」、「非敵國且非藩屬國」、「非東亞藩屬國」以及「東亞藩屬國」，據此梳理出中國在盛世時期特殊的外在衝突處理模式（如同本研究最初預期的，此一模式在王朝新生之初並不適用）：一、當對手國並未主動挑釁中國時，中國會予以更親近者更好的待遇，甚至不惜出兵相助；二、當對手國並未主動挑釁中國時，中國可能會主動、預謀以武力襲擊關係越疏遠者；三、當對手國主動挑釁中國時，由於對方並沒有依循其地位做出合宜的行爲，因此中國會對關係越親近者，施以更強力度的懲罰，此種懲罰機制是帶有情感成分，甚至併吞版圖。

此外，進一步檢視新生漢朝、盛世漢朝、新生唐朝以及盛世唐朝這四個時段的中國，當與其他國家爆發衝突時的起因、過程與中國面對衝突的處理方式，並透過將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對手國以「親疏遠近」（名分秩序）爲分類標準，據此梳理並簡化漢唐中國的外在衝突處理模式，分別是：

1. 「新生漢唐 vs 藩屬國」：無挑戰時，較和善；面對挑戰時反應並不激烈。
2. 「新生漢朝 vs 敵國」：姑息型扈從，以和親與避戰方式面對衝突。
3. 「新生唐朝 vs 敵國」：抗衡型，主要以防禦面對衝突，也會伺機突襲。
4. 「盛世漢唐 vs 藩屬國」：無挑戰時，極和善；面對挑戰極強硬。
5. 「盛世漢唐 vs 敵國」：直面衝突，主要以進擊面對衝突，也會伺機突襲。

---

本文將所指涉的「關係親疏」一詞，定義爲：在天下體系中與漢唐中國曾出現過互動的諸國，由漢唐中國主觀認知、根據對方的歷史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差異程度（基本依據血緣或是否同爲儒家文明），做出不同程度遠近的區分。其中，以史書中記載該藩屬國「可考」的祖先、立國君主或統治集團實際具有漢人身分者爲最親（以血緣爲考量），其餘藩屬國次之，再次是非藩屬國也非主要敵國者，最後則是該朝的主要敵國。而後根據這樣的定義進一步研究漢唐中國的「衝突－回應」決策模式，並找出漢唐中國會在對手國挑起衝突的情況下，對關係越親近者施以更強硬的回擊。而本文所得出的假設與結論也恰恰驗證了石之瑜所指稱的：若認定對方與自身同屬一群，而對方做出有悖其角色的行爲時，那麼自身便會相當憤怒，並試圖予以懲罰。另一方面，假若對方與自身關係相當疏遠，並不屬於同一群體時，一旦對方做出不友善的行爲時，並不會如此憤怒（石之瑜，2020：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這幾個模式中，我們也分別驗證了我們根據國力以及關係遠近所提出的研究假設，包括漢唐兩代在國力較弱時，會以國家存亡爲優先考量，面對強敵選擇抗衡或扈從，而在漢唐與主要敵國（現狀霸權）間國力差距逐漸縮小之際，作爲崛起國的漢唐兩代均並未對現狀霸權國做出頻繁的挑戰。而當漢唐兩代國力鼎盛時，面對威脅時，會根據挑戰來源國不同而做出不同反應，一旦出現來自藩屬國的挑戰時，中原王朝會因對方並未恪守本分而施以最強烈的懲罰，此與儒家和平論中強調儒家文明圈內會相對和平的論述不盡相同，甚至儒家文明內部的衝突強度可能遠強於儒家與其他文明的衝突，突顯一旦出現衝突時中國對關係較親近者的強硬態度，另一方面，也會爲了維繫天下秩序，對親近者施以更多援助。

本文試圖探究崛起過程中的漢唐兩代面對外來衝突決策，而學界對崛起國的衝突曾提出不同解讀，在本文接下來的篇幅中，我們將先提及相關理論，其次述及兩個研究假設、個案的比較以及發現等部分。

# 壹、既有理論的侷限與應用

## 一、攻勢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理論：因興起而擴張？

對所有現實主義者而言，由於國際社會屬於一種無政府狀態，國家作爲一個理性的行爲者，爲求生存將致力於追求權力（不論是作爲手段抑或是目標），而古典現實主義基本假設崛起國會對國際現狀感到不滿。而攻勢現實主義學者 John Mearsheimer 進一步指出：由於無政府狀態與自助原則，各國對彼此的意圖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國家必然極力擴張自我權力以確保安全，又因權力增加是沒有限度的，目標在於成爲全球霸權，但即便是美國也僅能成爲區域霸權，所以國際社會上的權力競逐是不會停止（Mearsheimer, 2001: 20-42），因此，大國之間爲了生存，安全競爭將不斷加劇，最後甚至導致大國之間的戰爭（Mearsheimer, 2001: 334-359）。攻勢現實主義與其他現實主義相比較爲特別之處便是透過積極攻勢以達到追求權力極大化的目標，而當一個逐漸崛起的政權試圖透過積極擴權以便維繫自身的安全感時，便意味著其將透過更多的主動發起的戰爭以達到擴張的目的（鄭端耀，200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元綱（Wang, 2010）在檢視過明朝的歷史後指出，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才更適合用以描述當時的東亞國際秩序。他認爲歷史上的中國與其他國家並無二致，也會在強大時進行侵略，在衰弱時轉爲消極，明朝初年的情形與美國開國初期相當類似，也是不斷擴張領土，隨後再向海外擴張政治影響力，而建構朝貢體系實際上也是尋求擴張實力的途徑，宣揚儒家和平思想也僅是帝國尋求擴張的工具，因而中國歷史上的霸權與世界建立的霸權發展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此外，「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也是一個用來描述國際局勢變遷過程中，現狀霸權和新興強權的互動理論。A. F. K. Organski (1958) 將國際政治中的所有國家，分爲：「支配型霸權」（dominant power）、「強權國家」（great powers）、「中等國家」（middle powers），和「小國」（small powers）四種類別，其中，由於支配型霸權主導國際秩序，基本上是對現狀滿足的，除了支配型霸權以外，其餘國家對現狀的滿足感是與其國家權力大小成反比。然而，一旦做爲第二級的強權國家的國家權力崛起，拉近與支配型霸權的差距，甚至足以威脅其地位時，第二級國家便有可能試圖顛覆國際現狀（Organski, 1958）。接續著這樣的概念，Organski 與 Jacek Kugler 於 1980 年發表 *The War Leger* 一書，進一步指出當崛起國與現狀霸權國出現權力交叉時，崛起國必將取而代之的危險。當權力差距縮小，霸權國會急欲阻止權力轉移的發生，而挑戰者會開始致力於形塑新的國際秩序，衝突多半發生在權力轉移的過程當中（Organski & Kugler, 1980）。

簡單來說，一個逐漸崛起的政權，在經過理性的效益評估後，便極有可能選擇對外擴張以進一步增加國家權力。綜合攻勢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我們可以推斷出漢唐中國在建國之後，必定會因對周邊環境的不確定性，而對周邊國家主動施予攻擊，以便急速擴張自身權力，確保國家生存，然而實際情形卻非如此。

## 二、守勢現實主義、修正權力轉移理論等：興起但不必然擴張

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對國際政治較爲樂觀，認爲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不必然會導致衝突，一方面是誘發侵略的動機不多，另一方面是仍有些因素足以化解戰爭行爲。此外，守勢現實主義不同意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勢現實主義的主要論點－權力極大化，反而認爲國家權力過多是有害的，而積極的對外擴張或進行侵略，都會引發他國的制衡，由於國家是理性的行爲者，在採取行動前，都會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當效益遠低於成本時，國家會避免行動，以保障國家基本安全。誠如 Waltz 所言：「國家的第一要務不是使其權力最大化，而是保持在體系中的地位」。守勢現實主義者認爲，國家追求安全的最好方法是維持既有的權力平衡，而不是一昧追求權力極大化，國家只需適度的權力即可，因爲過多的權力反而會引起他國採取措施加以制衡，最終還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因此，維護國家安全的有效辦法是謀求有限的外部利益，建立小規模的軍隊和執行謹愼克制的外交政策（Walt, 1987）。而當面臨嚴峻的安全困境時，理性的國家會在同時考量：國家的動機、影響國家攻守能力的物質力量以及國家對對手國動機的判斷，這三個因素的情況下決定國家的具體戰略，若國家同時判斷自身與對手國同爲「追求安全國家」（security-seeking states）時，便會減少雙方衝突與軍備競賽的可能性，但假若判斷他國爲「貪婪國家」（greedy states）時便會加劇雙方競爭力度。除了從國家安全與利益角度出發考量之外，守勢現實主義學者也指出當防守的選項明顯佔優勢的時候，國家也不會因爲國力增強而貿然對外擴張（Andreski, 1968: 75-77；Jervis, 1978: 187），僅有當攻勢顯然居於優勢時，例如在征服具有高度勝算時且可獲豐富戰利品以及國際反彈行爲有限的情況下，國家才會進行擴張政策（鄭端耀，2003）。簡單來說，對於守勢現實主義者而言，一個國家在興起的過程中不必然會對周圍鄰國發動武裝衝突，若是動武誘因減少或者是進行侵略將付出過大代價，基於自身安全與成本效益的考量，便不會產生與周邊發生衝突的意圖。

另一方面，堪稱是新一代權力轉移理論的代表著作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於 2000 年出版，書中指出，當一個挑戰國擁有現存霸權國 80% 的實力，權力將開始移轉，而當挑戰國擁有現存霸權國 120% 的實力時，權力移轉完成，挑戰國成爲新興的霸權國，而權力過渡階段將大幅增加衝突的可能性（Tammen et al., 2000: 21）。與過去理論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渠等將「國家意圖」納入考量。與霸權國拉近權力差距的新興強權，不必然會成爲現狀霸權國的威脅，假如新興強權對既存的國際現狀是滿意的，那麼便可能不會試圖挑戰現狀霸權甚至是顛覆既存的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際秩序。Tammen & Kugler (2006) 製作了一個模型，將其套用到東亞政治上，指出在東亞各國間的互動是有可能有危險，但並非完全的對立，且這種危機是有機會和平化解的。在此模型中。他們將滿意度、相對權力以及是否發動戰爭，分列爲三個不同的變項，並以之爲 X 軸、Y 軸、Z 軸，製出了可能會發生戰爭的熱點所在位置，並指出中美兩國並不一定會發生衝突，若台灣問題可以被解決，並且讓中國能夠在既存的國際秩序中嶄露頭角，加速將中國整合進世界體系之中，中國便可能對現狀滿足。對此，學者吳玉山（2010：389-415）也指出，在權力轉移的過程當中，若既存國際秩序的彈性足以容納新興強權興起，那麼便欠缺大國發動戰爭的誘因。

除了上述的國際關係理論應用於探討中國崛起之後的國際局勢之外，另一方面，近來出現不少中國學者開始透過分析中國的歷史經驗或典籍進而指出一個大國即便是興起，也不會選擇對外擴張的論點。

舉例來說，時殷弘（2011：4-33）整理了中國戰略史，並指出中國在歷史上戰略運用可能依著情勢偏向孫子式或是儒家式，並且中國通常在力量與情勢的對比之下，會選擇代價最小化而非收益最大化的策略，因而不會選擇積極對外擴張。李彬（2009：61-87）透過對不同規模與層次的行政實體做比較的方式，進而觀察低層次實體的行爲來推測高層次行政實體的策略，告誡世人擴張行爲無利可圖。王日華（2016）曾整理了春秋時期秦國崛起與周王室之間的互動並比較了許多西方案例後指出，透過國家自身發展來獲取權力的「內生型崛起國」由於不是透過聯盟與擴張的方式來獲取權力，因而不會引發崛起國與既存霸權國之間的直接戰爭。此外，經濟發展優先的崛起路徑由於增強了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經濟互賴，因此緩解雙方的恐懼，春秋時期的秦國便是走了一條內生型經濟發展優先的崛起之路，並與周王室之間實現了領導權的和平轉移。王日華認爲現今的中國自 1980 年後的跡象證明其亦爲內生型的崛起，而國家的目的並不在於藉由與外部的結盟與武力擴張以獲取利益，因此雖然與周邊發生小矛盾與摩擦但終究沒有引發戰爭。

上述這幾篇是以中國歷史或典籍作爲研究對象並藉以探討中國對外戰略的文獻，基本上是在確立（歷史或當代）中國擁有相當的國家能力的情況下，主張崛起國不必然會選擇對外擴張。簡單來說，這些文章與第一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獻的差距在於其彰顯了國家究竟是否對外動武，絕不是單純僅繫於國家能力的強弱而已，尚須考慮戰爭意圖的大小。

## 三、儒家和平論與東亞和平論：因文化而必然和睦？

Robert Kelly 以清朝中國爲案例，透過跨國比較後指出由於儒家文化不鼓勵使用暴力且崇尚仁義，因此，若對方被視爲同屬儒家文化圈，那麼清朝中國便不會因爲自身實力擴張而去侵犯弱小國家（2012：407-430）。王日華認爲「孔子國際主義」（國際道義、穩定國際秩序、追求國際和平、國家自省自律等）直接影響了當代中國的外交方針，包括和平共處五原則、求同存異的外交方針、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平發展的外交戰略以及和諧世界的外交理想等（王日華，2011：47-54）。同樣著重孔子的國際思想的余麗等人指出，孔子的理論有三大特色：「禮之用、和爲貴」的國際秩序觀、「義以爲上」的國際合作觀、「德不孤、必有鄰」的國際形象觀，渠等認爲這些思想有助於提供在當代建構和諧穩定的國際秩序並加強國際合作時的參考。徐進根據孟子的國際政治思想指出唯有講求王道的國家才能長治久安的王天下，只在乎利益的霸道之國，雖然可能稱霸天下，但終究是短暫的。徐進認爲此觀點可以提供中國作爲日後將要成爲怎樣的大國的參考（2009：6-16）。此外，康燦雄（David Kang）也指出由於東亞地區自古以來基本屬於階層式的國際體系，當中國處於穩定狀態時，東亞各國便會因權力、利益、文化與制度等關係與中國維持緊密且和平的關係，而中國也會以懷柔與利誘等方式維持雙方穩定關係（Kang, 2003: 57-85；2007）。陳康令的觀點也與之相似，「禮治穩定說」認爲當中國實力越強禮治結構便會越成熟，東亞秩序就越穩定，將穩定地呈現一個像塔一樣的「關係型等級結構」（2015a：22-38）。此外，陳康令另撰文探討儒家天下中天下正統（即體系中的霸權國）與冊封對於體系秩序穩定的關係，他認爲隨著傳統東亞秩序的演進，重塑天下正統的國際戰爭數量大幅減少，維繫天下正統的國際戰爭數量始終維持在很低的水平。作者認爲在傳統東亞秩序禮治成熟的元明清三代，儘管面臨王朝更替，新王朝會透過武力爭奪正統地位取得國內統治權，但卻不會試圖打破既有的國際秩序框架，因而使得重塑天下秩序的國際戰爭大幅減少（陳康令，2015b）。上述論者分別取材自中國歷史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思想典籍並試圖將相關研究做跨時的連結，且得到相類似的結論：深受儒家文化浸淫的中國若是逐漸壯大，較少爲周邊帶來戰爭的危機。

由儒家系絡切入並透過史實與典籍對中國歷史不同朝代的對外行爲作出相關研究，誠然，若是將時間尺度拉長，並將歷史中國與周邊所有互動均納入考量，也許可以得出儒家文化圈的確和平相處的機率較高且時間較長的結論（Kang, 2003: 57-85；2007；Kelly, 2012: 407-430）。但本研究嘗試選取論者略而不談的衝突時期的互動，將焦點放在「發生衝突」[2] 的前提底下漢唐中國所做出的反應，試圖進一步找出歷史中國的「衝突－回應」決策模式，並指出一旦儒家文明圈內有國家對中原王朝發起挑戰，可能引發中原王朝猛烈的反擊，此一作法目的在於試圖補足在歷史上中國與周邊互動的全貌。換言之，我們希望透過這篇文章的整理，讓大家清楚了解中原王朝面對來自文化相似的對手國主動引發衝突的前提下中原王朝的回應方式，這個部分是現今的儒家和平論或東亞和平論者所忽略未談的部分。

## 四、理論的對話與應用

在我們檢視所選取的史料後，發現我們難以將攻勢現實主義或權力轉移理論應用於漢唐兩代於國力鼎盛時期的對外行爲模式。舉例來說，在本文所選取的時間段之中，漢朝僅有一次在對手國並未挑起衝突之前主動出兵攻擊：漢武帝元光二年（西元前 133 年），漢武帝決定罷黜和親之策，派出大軍 30 萬於馬邑設伏，不幸的是，行動的消息走漏，軍臣單于得知消息後脫逃，此次勞師動眾的圍捕出擊以失敗告終。而唐朝時期也只有三次在對手國並無挑釁的前提下對對方發動攻擊，分別是：唐高祖武德五年（西元 622 年），據傳東突厥內部鬧飢荒，唐將李大恩出師東突厥，但兵敗被突厥所殺；唐睿宗景雲元年（西元 710 年），安西都護張玄表主動率兵侵掠吐蕃北境；最後則是在武則天時期，唐朝趁後東突厥汗國陷入內鬥之際，且雙方並未發生衝突的前提下，主動派兵討伐突厥。根據本文所整理的史料不難發現，除了漢朝一次、唐朝三次的主動出擊之外，其餘發生在漢唐中國（本文所選取的時段）的戰爭與衝突，皆是導因於回應對手國的反應措

[2] 包括雙方發生衝突或是對手國本身遭遇內亂或外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施，並非源於漢唐中國因感受到生存危機而戮力於對外擴張獲取全力以鞏固自身霸權，攻勢現實主義難以解釋漢唐中國的對外行爲。另一方面，當漢唐中國政權穩固國力迅速攀升之際，漢唐中國面對與自身實力有懸殊落差的周邊小國時，也不會因爲自身的危機感，或是爲追求無止盡的權力擴張而以武力攻擊周邊小國試圖極大化自身權力以與主要威脅國對抗。在漢唐兩代的崛起過程中，不論是在建國之初抑或是國力鼎盛時期，均不會「主動」出兵攻擊周邊小國，而是根據對手國與漢唐中國的關係親疏與對手國的行爲，做出適宜的回應措施，基本上遵循著：「以越重的懲罰方式回應來自關係越親近者的挑戰，但絕不因極大化自身權力而主動攻擊他國，甚至兼併小國」的原則，與攻勢現實主義預期不盡相同。

其次，在崛起過程（權力轉移時期）中，漢唐兩代的決策模式也與權力轉移理論的描述有所出入，漢唐兩代均會在甫建國、國力不穩時率先挑戰霸權國，卻反而在兩國國力較爲接近時，戰略選擇趨於保守。舉例來說，在漢朝初期，由於北方匈奴對漢朝的侵略形成巨大壓力，初建的漢朝政權的生存與安全堪慮，漢高祖便率大軍與匈奴決戰，試圖扭轉雙方形勢，但白登一役後卻使漢朝情勢更加險峻，舉國失去與匈奴對戰的勇氣，導致之後數年封王與大將棄城而逃的常態，最終僅能以不斷和親尋求短暫安寧。另一方面，在唐朝初期，面對突厥來犯，更傾向於願意出兵抗擊突厥，包括僅因突厥鬧飢荒，便出兵進攻突厥（雖然此戰以戰敗收場）；或是當面對突厥來襲時（唐朝初建的短短九年不到的時間內，便對唐朝發動十七起大規模入侵的軍事行動，六十四次小規模的襲擾），唐朝軍隊有超過一半的機率會堅守城池，甚至有六次率軍出城迎敵，種種表現均足以證明新生的唐朝並不懼於對突厥用兵（林恩顯，1988）。

根據我們所彙整的史料發現，在東方國際秩序底下，當雙方權力差距逐漸拉近時期，漢唐中國的戰與不戰更多地考量實力、求安與利益，面對威脅漢唐中國會試圖以武力抵抗以保障自身安全，但若不可能，則會轉向扈從以保障國家生存，較符合守勢現實主義預期，而非爲擴權而主動挑戰現狀霸權國。此一論述也與專研當代中國對外行爲的觀察若合符節，Taylor Fravel (2005) 曾指出假若威權政體內部發生政權不穩情形時，則其對外在領土、邊界爭議上較容易採取妥協的策略，例如中國大陸在大躍進、天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門事件時，對邊界爭議相對消極。Andrew Nathan 和 Robert Ross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指出中國大陸在面對外在衝突時，以國家安全爲考量，使用武力的範圍只會達到嚇阻與防禦的目的而已（1997）。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在國力較弱的情況下可能會採取妥協或消極的策略來處理周邊衝突。

同樣從國際層次切入觀察的尚有史家王貞平，他在一本考察唐朝對外關係的專書中提出「多極」體系的概念，指出唐朝統治期間，其實亞洲地區是呈現一個多極的國際體系，具有多個實力足以相互競爭的國家時而對抗時而結盟，沒有一個國家足以稱霸天下之意（王貞平，2020：1），並藉以指出自古華夷兩分的世界觀是錯誤的，唐朝並非世界中心，而其對外政策也會因時制宜，有時會根據國內政局、國家實力或是決策者獨斷專行，也會因爲並未審時度勢而制定出「不宜」的政策而造成一連串戰略挫敗。然而，王貞平在文中並未對「宜」做出明確的判斷，而各個時代的戰略轉折也都並未交代原因，也常在大戰結束後回頭來檢討成敗的各項原因，舉凡國內政局、雙方實力對比、皇帝個人意志、要臣的政治思想、物質收益、各國之間權力角逐等都可以被歸因於「宜」或「不宜」的判斷標準，而我們所提出的對不服從藩屬國的懲罰也曾經是判斷標準之一（王貞平，2020：245-310）。不過王貞平所說的多極世界指的是西元 618～907，這是整個唐朝統治的時期，在這段期間中，亞洲各政權間的權力關係是多樣且不穩定的，但是王貞平也指出在西元 620～750 這段期間，由於唐朝政治穩定軍事與經濟實力強大，與四鄰相比實力顯然佔據優勢，因而並不算是所謂的多極世界體系，是在 755 年爆發安史之亂後，唐朝才開始由盛轉衰，多極世界體系才開始成形（王貞平，2020：1-3），而我們所選擇的唐朝的時間段恰好是西元 618～741 年爲止，正好是王貞平所說的唐朝國力處於鼎盛的時期，因此不存在亞洲國際體系權力不均的問題，基本上是呈現以唐朝爲主要霸權國的態勢。

最後是儒家（東亞）和平論的論述，誠如前面所說的，本文並不試圖挑戰儒家和平論而是將焦點放在「發生衝突」的前提底下漢唐中國所做出的反應，試圖進一步找出歷史中國的「衝突－回應」決策模式，並指出一旦儒家文明圈內有國家對中原王朝發起挑戰，可能引發中原王朝最爲猛烈的反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貳、研究範圍、假設與步驟

本文選擇中國在漢、唐自開國的新生時期以及盛世時期作爲研究客體，是因爲這兩個王朝都有著持續逾百年的盛世（滿清雖同樣有逾百年的盛世，但爲東北女眞人所建，中間上經歷漢化過程，研究上不可掌握的變數過多，因此未將清朝置入本研究），相對於其他朝代較短期的強盛時期，如明永樂之治等穩定許多，如此方能有足夠的史料供我們進行考察，並在本論文結論處，依據國力強弱，將漢朝與唐朝的新生時期（國力較弱）以及漢唐的盛世時期（國力較強）作兩兩比對。在這裡，我們打算先從縱向的、歷時性的角度耙梳在漢唐時期中國與週邊國家或部族一旦發生衝突時，中國將如何因應的歷史材料，以闡明新生漢朝與盛世漢朝以及新生唐朝與盛世唐朝的差異，而後再依據國力強弱區分，將新生漢唐以及盛世漢唐做橫向的比較。

本文所選取的研究範圍分爲四個時間段：

1. 新生漢朝（國力較弱）：漢高祖元年（西元前 202 年）起至呂后八年（西元前 180 年）11 月 13 日，漢文帝登基前止，共 23 年；
2. 盛世漢朝（國力強盛）：漢文帝元年（西元前 180 年 11 月 14 日）起至元帝元年（西元前 48 年 1 月 11 日），漢元帝登基前止，共 131 年；
3. 新生唐朝（國力較弱）：指涉的範圍是唐高祖武德元年（西元 618 年）5 月起至唐高祖武德九年（西元 626 年）12 月，唐太宗登基前止，大約九年的時間；
4. 盛世唐朝（國力強盛）：唐太宗貞觀元年（西元 627 年）起至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底（西元 741 年）爲止，略而不談的時期爲玄宗後期的天寶年間，一共 115 年的時間（本研究將武則天在位期間置於盛世唐朝中一併討論）。

其次我們必須要對所謂的「關係親疏遠近」做一個適當的定義。在中國文化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除了有遠近親疏之別以外，人們還會依循著這些區別決定如何適宜的互動。如《孟子・滕文公（上）》公篇：「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雖然不是每個中國文化圈內的人都能熟記這些文字，但在儒家文化方方面面的影響下，這些教條式的文字早已成爲中國社會中很尋常的互動方式。何友輝等人曾指出這樣的關係取向，意味著個體間的回報、互倚與相連性，個體在社會網絡中定位後，其他人便知道如何與此人交往互動，在這樣的氛圍下，社會行爲是被關係背景所決定的（2007：59-60）。這種依據「關係」所對應的名分地位，並進而確立彼此之間情感與義務乃至於獎懲的型態，正是禮記中所提及的「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示非」（《禮記・曲禮》），足見在中國社會中的人際互動，「差序格局」式的互動方式是相當明確的。

費孝通與金耀基都曾指出，中國社會是由一張張隱形的關係網所覆蓋。這個網絡是以個人爲中心，以人倫爲經、人際關係爲緯所構成的，而每個人都會按照他的固定位置的行爲規範來行動。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即中國人在社會中與人互動的基本框架，以自身爲中心，按照關係親疏區分成內外圈，在互動過程中，以自我爲中心，並依其關係遠近與他人應對，在這樣的體系中，每個個體都鑲嵌在關係網絡裡，一舉一動都牽動著這個關係網。如此建構的人際關係網絡，與西方社會強調個人的互動方式迥異，那麼由此展開的以國家爲單位的國際關係應該與西方有所不同。西方式的「個人定向」的社會結構是以獨立且平等的個體爲單位，而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也是源自這樣的概念，國家是獨立且自由平等的個體，行爲依循著理性且自立自主的方式進行，目的在於追求個體的利益，國際社會的運行是依靠著法律制度來維繫。而中國式的「社會定向」的社會結構，是以「人倫」爲經、「關係」爲緯組合成一個緊密、有上下秩序的社會（楊中芳，2001：13）。那麼中國式的國際關係理論也應該是根源於這樣一種社會結構，國家與國家之間應該是存在於一個關係網絡之中，彼此的行爲模式依循著彼此之間的關係背景來運行。

中國建構的國際體系源於分封制度所產生的朝貢與回賜關係，隨著思想的興起及流傳、帝國的興建及與鄰邦的互動過程，逐漸形成一種東方所特有的、有等級差別的國際秩序體系，在周代奠定了穩固的理論基礎，此後因漢朝以政治、外交及武力手段經營西域，西域五十餘國懾服並與漢朝建立起藩屬關係。原先由天子所轄王畿與諸侯國所構成的藩屬體制，逐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展成一個統一的帝國與周邊諸民族及鄰邦經互動而形成的體系。也從中衍生了更多繁複的禮儀與制度，這些要素、禮儀和制度等也就型構了由中國居主導地位的「東方國際秩序體系」。在「天朝思維」和「大一統理念」的支配下，這種「東方的國際秩序體系」是一種「有等級」的對外關係。

中國自兩漢時代開始積極派遣使者前往各邊疆部族包括西域諸國，對中國本身來說，頻繁派遣使者（包括和親使、冊封使、安撫使等）通好各國目的在於藉由建立起雙方的政治、經濟、文化關係以穩固漢帝國的安定及興盛，甚至是藉由「遣使」、「招撫」、「冊封」擴展漢王朝的版圖。由於「冊封」是一種君主對臣子的權力，因此，不論是「冊」抑或是「封」，接受冊封的一方便整合進這個有著階層秩序的體系，並承認中原王朝的天朝上國地位。這個由中國建構起來的國際秩序中與藩屬國之間的各種禮儀規範、往來方式、授爵、授與國書、遣使、貢道、貢期……等等，甚至連哪個「階層」的藩屬國要在哪個驛站休息；國宴坐哪個位置；各藩屬國使者誰先下跪、誰先發言……等，都是一套套井然有序的制度，任何一個小細節都牽涉到中國與該藩屬國甚至是所有藩屬國的關係（王貞平，1997）。由此可知，在以中國爲核心的「東方國際秩序體系」中藩屬國與中國的「關係」親疏遠近至關重要。

本文中所指涉的「關係」便是這種「關係」，概念上與秦亞青、石之瑜與張啓雄等人所指涉的大同小異，只是，上述三位學者所指稱的「關係」可能具有更多的哲學層次的意義與探討的空間，而本文並不打算探討「關係」一詞本身，僅將本文所指涉的「關係」一詞，定義爲與漢唐中國曾出現過互動的諸國與中國之間的聯繫，而關係的親疏遠近的判斷標準則是從漢唐中國的「主觀」判斷，根據在中國官文書記載中，中國對雙方的歷史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差異程度，做出不同程度遠近的區分。其中，以史書中記載該藩屬國「可考」的祖先、立國君主或統治集團實際具有漢人身分者爲最親，其餘藩屬國次之，再次是非藩屬國也非主要敵國者，最後則是該朝的主要敵國。

緊接著是研究假設的部分。首先，根據守勢現實主義中以政權存續爲首要目標的推論，擬定出本研究的假設 1，對古今中外國家而言，政權存續必是第一要務，而以國家存亡爲考量，弱國可能採行的策略則有抗衡、扈從或避險。其次，由於本研究所選取的四個個案，依據其國力恰好能做出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兩對比，在國力較弱時，對外動武與否會因受限於戰爭能力不足連帶影響對外發動戰爭的意願。但是在國力逐漸強盛後，由於維繫政權穩定存續的基本條件滿足之後，中原王朝的對外動武意願將更多的與天下體系以及關係遠近等理念型的變項產生聯繫，因此我們據此作出相應的第二個假設。

在假設 2 方面，由於中國的社會是由一群透過倫理秩序鑲嵌的關係網絡所組成的，人與人的交往方式並非一視同仁而是以親疏遠近般的差序格局方式進行的，而中國式的國際關係也依循著這樣的路徑，即中國與周邊的互動關係呈現類似人際關係般差序格局的區別。[3] 在中國的系絡中，個人是依循著情境中的角色對應關係來行事，以確保其與外界環境的和諧關係，並進而形成一種評價標準。而在這種具上下統制特性的關係中，上位者將以各種權威方式強制下位者服從，而下位者必須忍讓以示服從（黃囉莉，2006：112-113）。如果沒有依循著合宜的倫理方式進行互動，在中國的情境系絡中，便會出現懲罰機制，由於在互動過程中帶有強烈的情感投入而非單純的經濟理性行爲，因此，情感束縛越強烈時，不遵守倫理規範的懲罰強度也會越重（楊中芳，2001：320）。此外，在關係理論中，「應屬同一群體的他者的行爲無法符合本身對其角色的期待時，會因自己的價值被否定而透過懲罰對方加以彌補」（石之瑜，2020：14-15）。據此，我們提出了假設 2.1。其中最爲重要的是我們認爲關係越緊密者，發生矛盾與衝突時，中國（上位者）反應越激烈。

另一方面，在假設 2.1 中我們也提到當對手國並未主動挑戰的情況下，中原王朝會對親近者施以不符合經濟理性、不求報償的恩惠，而對外人的態度則較爲理性。由於傳統中國人在社會中與人互動的基本框架，常是以自身爲中心，按照關係親疏區分成內外圈，並且依循著他者在關係網與自己的距離畫出不同程度的範圍，越親近者，情感投入程度越強烈，若雙方互動過程是遵循著倫理規範，這些成員所獲得的豐厚犒賞將如俛拾地芥般容易（楊中芳，2001：319-320），這種「好讓不爭」的人情味，僅存在於

[3] 張啓雄曾將人倫中的差序格局應用至建構國際關係理論，指出「中國世界帝國」秩序原理其中之一，便是「親者法治，疏者禮治；愈親愈治，愈疏愈不治，半親半疏者，『不完全以不治治之』」（2013：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己人」之中，對於外人的互動則會回復到經濟理性的利益計算（黃光國，1998：46-48）。

假設 1　當國力較弱，中國（漢唐）面對外來挑戰會以國家存續考量爲優先，面對高度外在威脅時，中國會試圖採取抗衡策略迎接挑戰。若抗衡不可能，則轉爲扈從或避險策略。

假設 1.1　當挑戰來源國爲「關係最親近的東亞藩屬國」時，中國（漢唐）受限於國力，無法對其做出最強烈的反應。另一方面，在對手國並未先發起挑戰的前提下，當體系中的藩屬國遭遇外來威脅或內亂等危機時，受限於國力，無法給與有效的經濟或軍事援助。

假設 1.2　當挑戰來源國爲「關係最疏遠的主要敵國」時，中國（漢唐）受限國力無法做出有效的反擊。

假設 2　當國力鼎盛，中國（漢唐）的對外策略會根據挑戰來源國不同而做出不同反應。

假設 2.1　當挑戰來源國爲「關係最親近的東亞藩屬國」時，中國（漢唐）會因對方嚴重破壞體系中的名分地位關係而對其做出最強烈的反擊。另一方面，在對手國並未先發起挑戰的前提下，當體系中的藩屬國遭遇外來威脅或內亂等危機時，在對方的請求下，提供經濟或軍事援助。請求來自愈親近者，中國（漢唐）援助力道愈強。

假設 2.2　當挑戰來源國爲「關係最疏遠的主要敵國」時，中國（漢唐）會因對方對其國家存續產生的威脅而做出適度迎擊，反擊與憤怒程度遠小於前兩者。另一方面，在對手國並未先發起挑戰的前提下，中國（漢唐）爲維繫天下秩序以及體系內藩屬國忠誠，可能對體系的主要威脅國做出預防性攻擊。

在擬定完研究假設後，本研究將沿著以下步驟展開。我們將整理《史記》、《資治通鑑》、《漢書》、《新舊唐書》、《南越五主傳》等多份古籍裡，自漢唐兩代開國至盛世結束的過程中，中國與周邊發生衝突的原因以及雙方採取的應對之道的史料。並且先按照國力大小將漢唐兩代區分爲：新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期以及盛世時期，在每個時間段中我們會將對手國的作爲稍作分類，並討論同一行爲類別中，漢唐兩代對不同身分的對手國的反應策略。

在整理史料時，發現了數種不同的衝突發生原因以及各種不同的衝突解決方法，以漢朝爲例，漢朝的對手國主要的行爲有：雙方相安無事、對方陣營恰逢內亂或外患、小規模入寇、大規模入寇、不敬漢使、接納反叛勢力、與敵國交好、攻擊其他藩屬國、殺害漢使、多次殺害漢使、脫離體系、以他國爲上國、稱帝等幾個不同的行爲，由於行爲模式過於雜亂，因此，我們將上述所有行爲，根據行爲的特性，歸納爲三個類別，分別是：雙方原本相安無事（但是由中原王朝主動發起挑戰）、對方陣營恰逢內亂或外患（雖對手國與中原王朝爲爆發直接衝突，但當對方陣營面臨其內外衝突時中原王朝的反應），劃歸爲「雙方無衝突」；小規模入寇、大規模入寇，則合併爲「雙方發生軍事衝突」；接納反叛勢力、與敵國交好、攻擊其他藩屬國、殺害漢使、多次殺害漢使、脫離體系、以他國爲上國、稱帝，這些行爲統稱爲「危害體系的衝突」（與單純軍事衝突相比，通常涉及更多外交層面）。

其次，將對手國的行爲模式做初步分類後，再將所有與漢朝以及唐朝發生衝突的國家予以分類，分別爲，第一類：主要敵國；第二類：非主要敵國且非藩屬國；其次是非東亞地區的藩屬國，最後則是東亞藩屬國，並將中原王朝與周邊發生的衝突，依據上述分類方式根據中原王朝的回應措施加以統計。

分類與統計完成後，我們將以「新生」或「盛世」來控制中原王朝的國力大小，再將對手行爲根據對中原王朝的威脅區分爲三大類型，以便控制住刺激的強度，最後再來看同樣中原國力與同樣對手國的刺激強度下，中原王朝的反應會不會因爲對手國與中國的關係遠近而有所不同。透過此種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兩種訊息，分別是：一、對同樣的對手國而言，做出類似的行爲時，漢唐中國在國力弱（新生時期）與國力較強（盛世時期）時會有甚麼不同的回應策略；二、可以根據關係遠近做跨類別的比較，當不同類型的對手國與漢唐中國發生同樣的衝突時，漢唐中國會採行怎樣的策略回應。希望透過這樣的分類與比較進而觀察漢唐中國的對外戰略是否的確會因國力強弱呈現一種上下層次的差異，在國力較弱時需要顧慮政權存續的基本需求，而在國力較強時，可以更多地考量天下體系以及關係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疏遠近等理念型的因素。

根據我們的分類與統計結果將在下一節中繪製成圖，在圖中我們會依據朝代、國力強弱以及衝突的種類繪製成圖 1 至圖 9，圖的 Y 軸是漢朝或唐朝的反應策略，越接近原點的反應越溫和，遠離原點的反應越強硬，X 軸則是依據對手國的不同所做的區分，越接近原點的與中原王朝關係越緊密，越遠離原點的關係越疏離。在中間的圓球狀標示爲中原王朝在面對同一個國群相似挑戰（或情況）時所作出的回應策略的佔比，每個圓球狀右下角的標示數據的分母爲同一個國群相似挑戰（或情況）的總數值，分子爲中原王朝所作出的回應策略的數值。

# 參、個案比較與發現

本文所研究的兩個個案的周遭環境均面臨：一個立朝之前即長期威脅並時常挑釁的強大鄰國；[4] 數個位處西域、西南與北方地區與中原王朝關係較不緊密的鄰國；數個西域、西南與北方地區與中原王朝已建立宗藩關係或擺盪的鄰國；位於東北或東南方在歷史或血緣上與中原王朝關係十分緊密的藩屬國，而這些鄰國在本研究所選的時段中，不時與中原王朝發生衝突（或是該鄰國本身面臨內外衝突），本研究旨在觀察當中原王朝國力逐漸強盛時，將如何因應與這些鄰國（在衝突事件中，本文稱之爲對手國）的衝突。底下，我們將討論依照中原王朝國力強弱，分爲：新生時期漢唐（國力較弱）與盛世時期漢唐（國力較強）做討論與比對。

## 一、新生時期（國力較弱）

漢文帝與唐太宗即位前，中原王朝初建，國內動亂未平，均爲本文所定義之「新生時期」（中原王朝國力較弱），準確來說，漢朝初年在本文中所指涉的範圍是漢高祖元年（西元前 202 年）起至呂后八年（西元前 180 年）11 月，漢文帝登基前止，總計約 23 年；唐朝初期指涉的範圍是唐高祖武德元年（西元 618 年）5 月起至唐高祖武德九年（西元 626 年）12 月，唐太宗

4　唐朝盛世時期另有新崛起並相當強大的吐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登基前止，大約 9 年的時間。在這兩段時期中，由於國中尚有殘餘勢力，且立基未穩，與周邊處於磨合期，對於來自周邊的衝突行爲步調不甚一致，邏輯也與中原王朝國力較強時期不甚相同。簡單來說，在漢朝初年，雖曾有雄心抵禦北方外侮，起初也曾以抗衡策略因應匈奴入侵，但在漢高祖親征於白登被圍後舉國畏戰，[5] 對匈奴的戰略從原先的抗衡轉爲扈從，基本對來自匈奴的挑戰均選擇和親、避戰的戰略（林幹，1986），即本文的「新生漢朝 vs 敵國模式」；而唐朝初年，雖因分裂割據國力也不強，但未曾經歷過與漢朝初年的「白登之圍」相似的大敗經驗，與主要敵國實力相差雖大但不至於一戰即潰，以至於當面對衝突時，大多數情況會派兵抵禦，屬於「抗衡」策略，甚至可能在對方並無挑釁的前提下，主動襲擊對方，即本文的「新生唐朝 vs 敵國模式」。底下將深入漢唐兩代初年的情勢加以描述並總結。

關於漢朝初年如何處理與外在的衝突的問題，由於在漢朝初建的 22 年間，僅有匈奴與南越國與漢朝發生衝突，根據本文的計量方式，其實沒有辦法做出一個很完整的、供比較的圖表，因爲根據我們的設想，是必須要有多類型國家、引發相同程度的衝突，才能夠比較漢朝的反應輕重緩急，但在這裡對手國僅有匈奴與南越國，而對手國的作爲也僅有匈奴方面的幾次大小軍事攻擊以及一次南越國的稱帝事件，故而難以比較。

匈奴在新生漢朝時期，共對漢朝發起了八次大小規模的軍事攻擊，漢朝方面曾有兩次守軍防禦成功的紀錄，以及一次面對大規模來襲，派大軍抵禦但是大敗的經驗（即白登之圍），另外則有高達五次面對匈奴來襲不抵抗甚至是落荒而逃。足見漢朝對匈奴的主動挑釁反應的次數與激烈程度均較低，然而這些反應均是由於漢朝初立實力不穩加上漢高祖於白登被圍的經驗所致，並非基於一個天朝上國對於化外之地的騷擾的不屑一顧，況且此時的漢朝也還沒有完全建立其天朝上國的地位。另一方面，漢朝面對已然歸附的南越國稱帝，呂后派出大軍進擊，但卻大敗而歸，從史料中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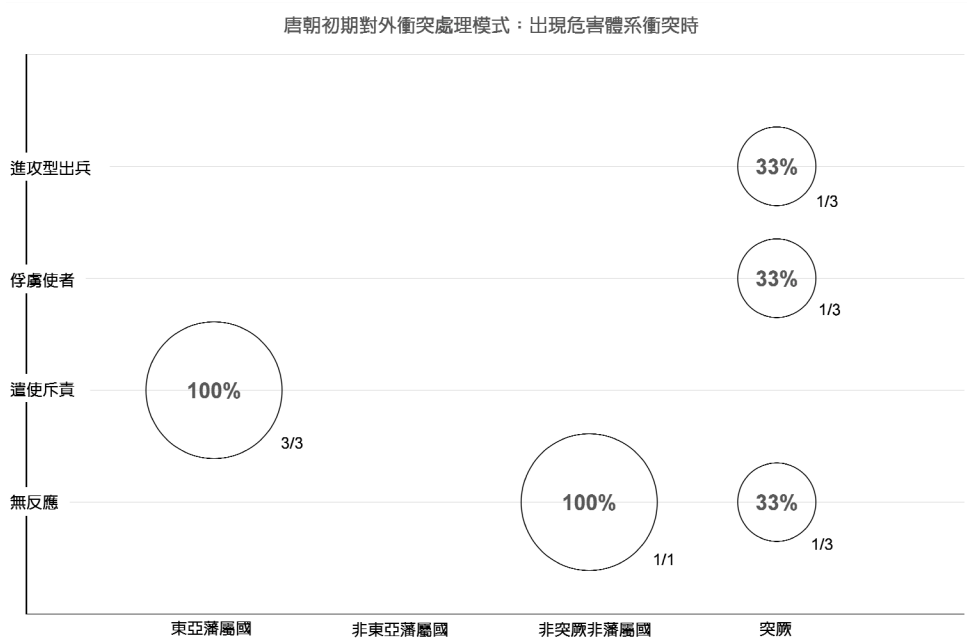
5 如白登之圍後數日，匈奴大軍再攻代郡（今河北省蔚縣一帶），兩軍尚未交戰，代王便棄國逃回，漢軍投降不敢抵抗，劉邦僅貶代王爲合陽侯，並沒有進一步怪罪他不戰而降的責任。《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次出兵南越並非由於南越國與漢朝關係相當緊密且南越國王爲漢人之故，而是由於呂后基於國內政爭的考量而犧牲南越國的利益所致（張榮芳、黃淼章，1991）。總而言之，在漢朝國家實力相對弱小、尚未建立穩固的天朝上國地位之前，對於外在衝突與挑釁的回應策略的考量都並非基於該衝突引發國與中原王朝的關係遠近而定，而是考量實力與利益，面對外來衝突會先選擇以抗衡策略因應，若抗衡失敗則轉爲扈從策略。

關於唐朝建國的初期是如何處理與週邊發生的衝突，由於在這段期間內與唐朝發生過衝突的國家種類與數量都足夠多，因此我們將其繪製成圖：[6]

**圖 1　新生唐朝對外衝突處理模式（雙方無衝突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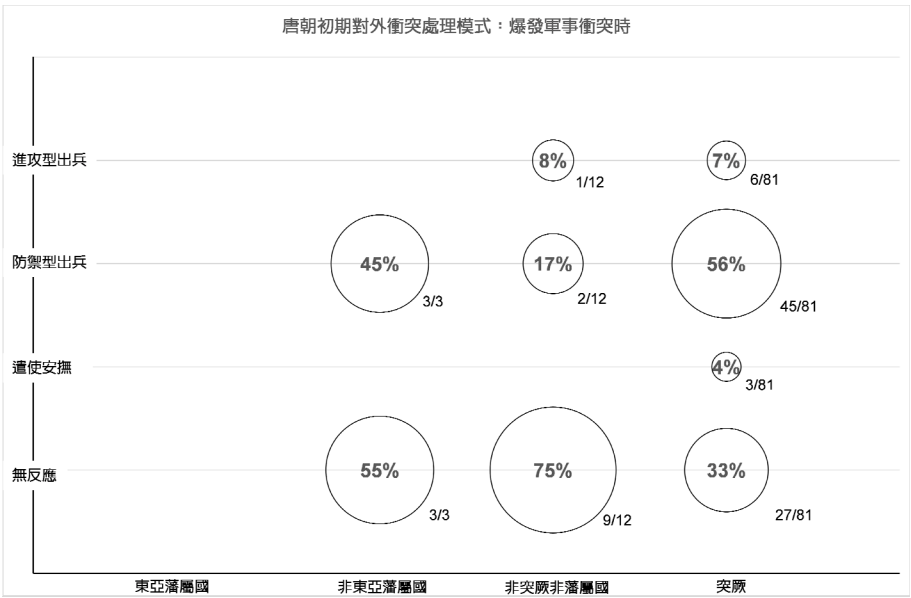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6　圖中圓圈內是發生比例，圓圈右下角的是中國在面對同一類型國家同一類型衝突的事件總次數和採行回應的策略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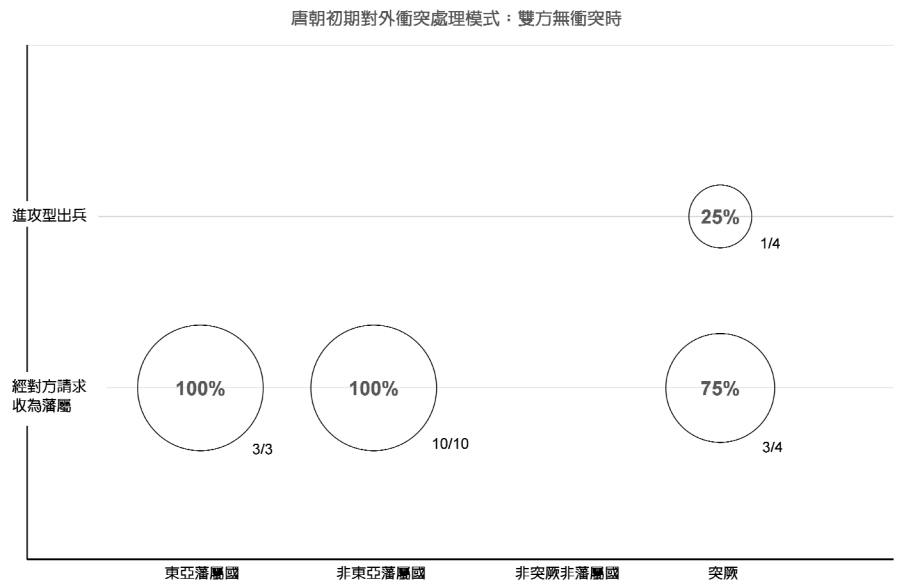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　新生唐朝對外衝突處理模式（爆發軍事衝突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3　新生唐朝對外衝突處理模式（出現危害體系衝突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雙方相安無事的情況下，新生唐朝可能會主動出兵攻擊主要敵國。而對於「東亞藩屬國」的態度，相對來說和緩。就這點而言，與盛世時期的漢唐相似，唯一的不同是新生唐朝並沒有在對手國的請求下出兵援助對手國的經驗（但是這個差別可能也是因爲在這段期間中，並沒有發生對手國陷入內亂或外患等需要援助的情形）。

但是當新生唐朝面臨外在軍事攻擊時，並沒有像國力較爲強盛的時期會呈現的類似同心圓般、且對關係越親近的對手國懲罰越重的情形。相反的，卻是出現對主要敵國的突厥的入侵更展現抵禦的決心。此外，若將新生的漢朝（約 23 年）拿來與唐朝相比，新生唐朝短短不到九年的時間，顯然面臨更多次數的外在對手國對其的軍事攻擊（姑且不論這些攻擊的強度，僅論次數），新生漢朝僅遭 8 次攻擊，而唐朝則遭到 115 次來自不同類型國家的軍事攻擊。

最後是危害體系的衝突，從圖 3 可以看出新生唐朝同樣也是沒有展現出「與中國關係越親近者，一旦發生衝突變處罰更重」這樣的原則，相反地反而是對突厥的反應會更加大，這樣的結論與前兩種類型的行爲包括「雙方無衝突」以及「軍事衝突」的結論有相仿之處。換言之，由圖 1 至 3 中可以看出，新生唐朝對於威脅的反應恰巧呈現關係越疏遠者越爲強硬，足見在新生唐朝時期，因與突厥國力差距不似漢朝大，抗衡策略成功奏效，使其面對來自突厥的衝突時反擊強度反比來自藩屬國的衝突更大，因而形成在新生唐朝時期面對來自關係越遠的對手國衝突時反應越激烈的樣態。

總結漢唐兩代新生時期經驗顯示，若以對手國的種類來看，當漢唐兩朝在新生時期（崛起國）面對主要敵國（既存霸權）時，根據本文研究，在中原王朝崛起之時，由於與霸權國的實力懸殊，在考量自身國家實力後，中原王朝可能會做出兩種不同的選擇：一、與主要敵國實力差距太大以至於一戰即潰時，中原王朝會調整原先的抗衡策略轉而選擇「姑息型扈從」，試圖藉由單方面限制自身行爲以避免觸怒大國，藉以換取與大國之間關係的和緩，即本文的「新生漢朝 vs 敵國模式」；二、與主要敵國實力相差雖大但不至於一戰即潰時，中原王朝會選擇「抗衡」策略，甚至可能在對方並無挑釁的前提下，主動襲擊對方，即本文的「新生唐朝 vs 敵國模式」。此外，當漢唐兩代在新生時期面對較爲親近的對手國，在雙方無衝突的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下，中原王朝態度會較敵國更爲親善；而在雙方發生衝突的情形下，新生的中原王朝並不會因藩屬國與其關係較近而對其懲罰越重，以唐朝而言，反而是在保全政權存續的前提下，以較大力度回應來自突厥的衝突（與藩屬國相比，即關係越遠新生唐朝反應越激烈）。

根據上述經驗，完全可以驗證我們所提出來的假設 1：當國力較弱，中國（漢唐）面對外來挑戰會以國家存續考量爲優先，面對高度外在威脅時，中國會試圖採取抗衡策略迎接挑戰。若抗衡不可能，則轉爲扈從或避險策略。至於在藩屬國方面，與盛世時期相同，在與對手國無衝突的前提下，唐朝初建時期也會對愈親近者愈比較和善（但不像盛世時期般，每個不同類型的國家間呈現完美的區別）。並據此整理出模式 1 至 3（分別對應本文假設 1.1 與 1.2）如下：

模式 1.「新生漢唐 vs 藩屬國」：無挑戰時，較和善；面對挑戰時反應並不激烈。

模式 2.「新生漢朝 vs 敵國」：姑息型扈從，以和親與避戰方式面對衝突。

模式 3.「新生唐朝 vs 敵國」：抗衡型，主要以防禦面對衝突，也會伺機突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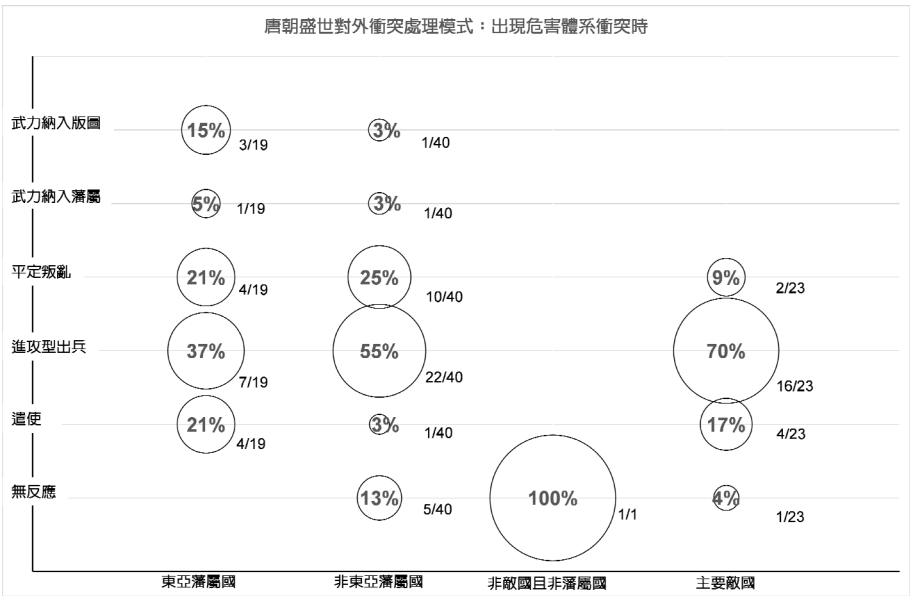
整體而言，新生漢唐主要是秉持著實力原則以政權存續爲最高考量來對應來自四鄰的挑戰，而對手國與新生漢唐的關係或親或疏的影響不盡相同。新生漢朝因國力過弱，面對來自關係最遠的敵國的衝突時，無法施以最強烈的抗衡反擊，相反的，新生唐朝面對來自關係最遠的突厥的衝突時，會施以最強烈的反擊。然而，當漢唐步入盛世，其對外行爲的模式便發生顯著的改變，當國家能力達到鼎盛時，對外決策便會更多的考量雙方的關係名分、對方的行爲是否合宜等。

## 二、盛世時期（國力較強）

漢朝文帝登基（西元前 180 年 11 月 14 日）起至元帝元年（西元前 48 年 1 月 11 日），漢元帝登基前止，共 131 年，以及唐太宗貞觀元年（西元 627 年）起至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底（西元 741 年）爲止，一共 115 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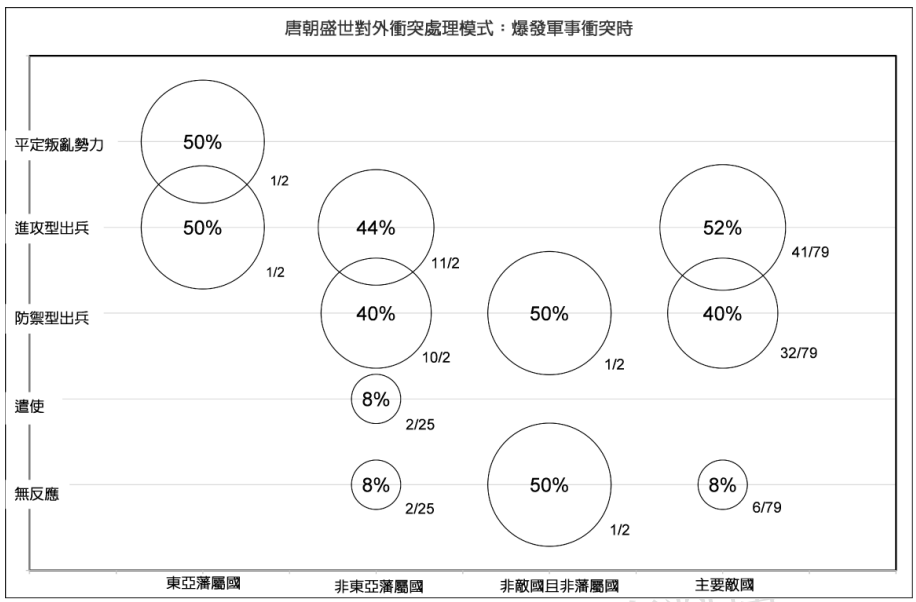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4　盛世漢朝對外衝突處理模式（雙方無衝突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5　盛世唐朝對外衝突處理模式（雙方無衝突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間，爲本研究所指涉之「盛世時期」（中原王朝國力較強）。底下，我們分就（中原王朝與對手國）雙方無衝突、爆發軍事衝突、出現危害體系衝突，做兩個朝代的比較分析。

首先是盛世時期與對手國並未發生衝突時中原王朝的作爲，這種情況主要是包含：「在對手國並未主動引發與中原王朝衝突的前提下，中原王朝主動挑釁對方」，以及「對手國發生內亂或外患時」，這兩大類中原王朝的反應，並不包括承平時期中原王朝與對手國的宗藩關係、朝貢往來、民間互動、邊境貿易等。

根據圖 4 與圖 5，X 軸越靠近原點表示表示對手國在親疏關係的光譜中與中原王朝關係越緊密。Y 軸越往底下代表漢朝的反應越緩和甚至是熱情，最底下的是爲援救對方不惜派出朝廷大軍，越遠離原點，意味著中原王朝反應越激烈。從這兩張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個情形是：在雙方無衝突的前提下，中原王朝對東亞藩屬國的態度可說是相當熱情，面對東亞藩屬國的困境絕大多數時候是會選擇派出朝廷大軍前往救援，而同樣情況下，中原王朝較不可能出兵救援關係比較疏遠的對手國。

然而，同樣在雙方無衝突的前提下，漢唐兩代都曾經「主動」攻擊主要敵國。漢武帝元光二年（西元前 133 年）那場由漢武帝主動挑起的馬邑之戰，相當值得關注，除了因爲這場大仗是經過漢朝方面精心謀劃並且動員超過 30 萬的軍隊之外，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場由漢朝「主動」挑起的戰事。這點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國家完全不同，盛世時期的漢朝並不會在其他類型的對手國並未主動挑起衝突的前提下，做出主動出擊的動作，但是對做爲主要敵國的匈奴卻相反。不約而同的，唐朝也有兩次「主動」出擊主要敵國的經驗，分別是：唐睿宗景雲元年（西元 710 年），安西都護張玄表「主動」率兵侵掠吐蕃北境，以及武則天時期，唐朝趁後東突厥汗國陷入內鬥之際，且雙方並未發生衝突的前提下，「主動」派兵討伐突厥（劉學銚，2019）。這兩次的經驗說明，盛世時期的唐朝是有可能會在主要敵國並未對其發動攻擊或挑釁之前，趁對手國內鬥不止或是趁其不備，便「主動」派兵攻擊對方，佔比 17%。這一點是明顯與唐朝對待其他對手國的群組迥然不同的。就此而言，漢唐兩代在無衝突的前提下，對待主要敵國的態度是相當類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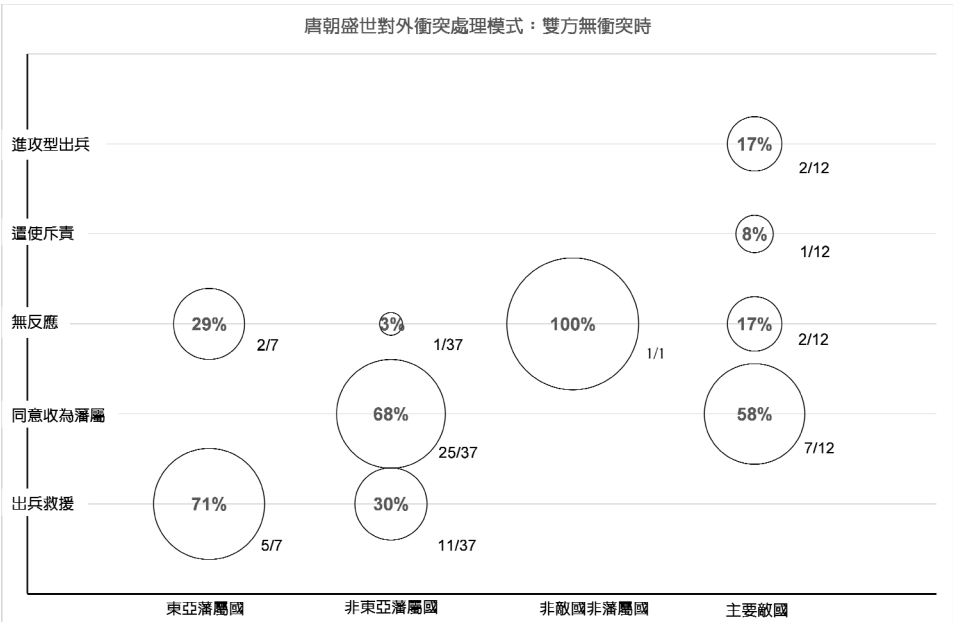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其他類型的國家方面，漢唐兩代也可能在「非東亞藩屬國」的請求下，出兵援助對方，但是佔比沒有「東亞藩屬國」高，至於其他的非藩屬國若陷入內外交迫的窘境，中原王朝則大多無視，既不會趁機偷襲，也不會派兵加以援助。

因此總結當盛世時期的中原王朝與對手國並未發生衝突時，中原王朝的策略是：一、對「東亞藩屬國」相當熱情，甚至不惜在對方陷入危局時，並在「對方請求」的前提下，派兵加以援助；二、可能會趁主要敵國不備或是陷入困難時，「主動」出兵襲擊主要敵國；三、中原王朝對於其他兩個類型國群態度，基本介於中間，在上圖中呈現顯著的曲線。

接下來看到的是當對手國主動挑起「軍事衝突」的情形底下，中原王朝的回應。這種情況包括了：「小規模的出兵掠奪邊境或單純攻打單一城池」以及「大規模地同時對數個地區發動軍事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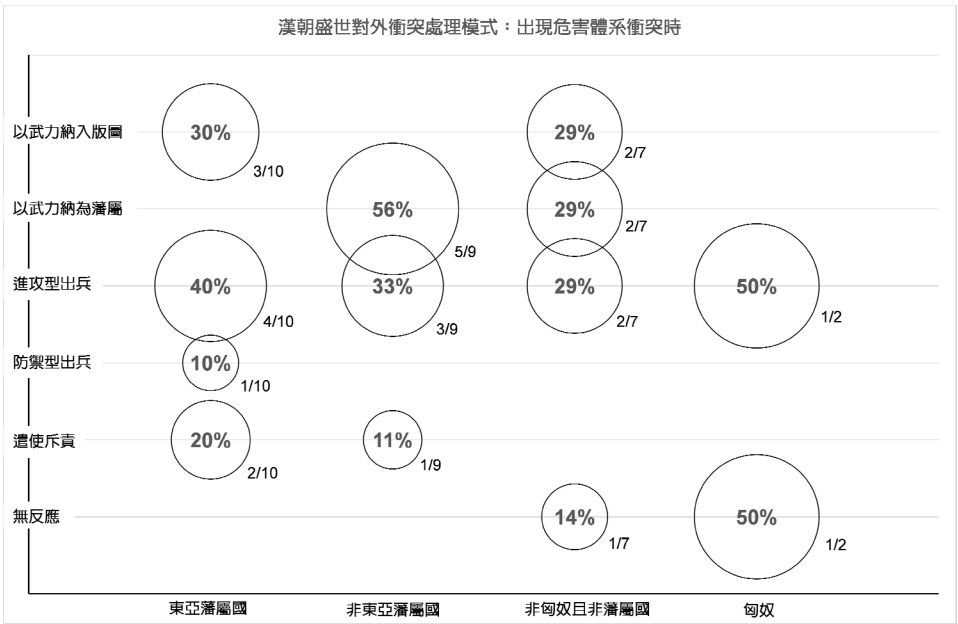
**圖 6　盛世漢朝對外衝突處理模式（爆發軍事衝突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7　盛世唐朝對外衝突處理模式（爆發軍事衝突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6 與圖 7 中，X 軸越往左表示對手國在親疏關係的光譜中與中原王朝關係越緊密。Y 軸越靠近原點代表漢朝的反應越緩和甚至是消極不回應。首先看到的是「東亞藩屬國」，在漢朝時期，南越國曾經有一次對漢朝發動軍事攻擊，漢朝方面則是派兵強制以武力將其收入版圖。武帝元鼎五年南越國權臣呂嘉遂正式起兵叛漢，並出兵殲滅兩千漢軍，武帝下令進攻南越，在圖中機率爲 100%。而唐朝方面，因來自「東亞藩屬國」的軍事攻擊，唐朝曾有一次出兵攻擊對方以及一次出兵平定對方叛亂主力的紀錄，佔比分別達到 50%。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前後，高麗王大權被泉蓋蘇文架空，泉蓋蘇文多次發兵襲擾唐境，唐太宗選擇展開大規模的討伐高麗的戰爭。另一次是唐高宗顯慶五年，由於高麗軍的挑釁，唐軍分兵水陸兩路進軍高麗，共斬殺高麗軍 3 萬餘人，僅泉蓋蘇文孤身逃回，唐軍平定叛亂主力，這是唐高宗第三次大規模東征高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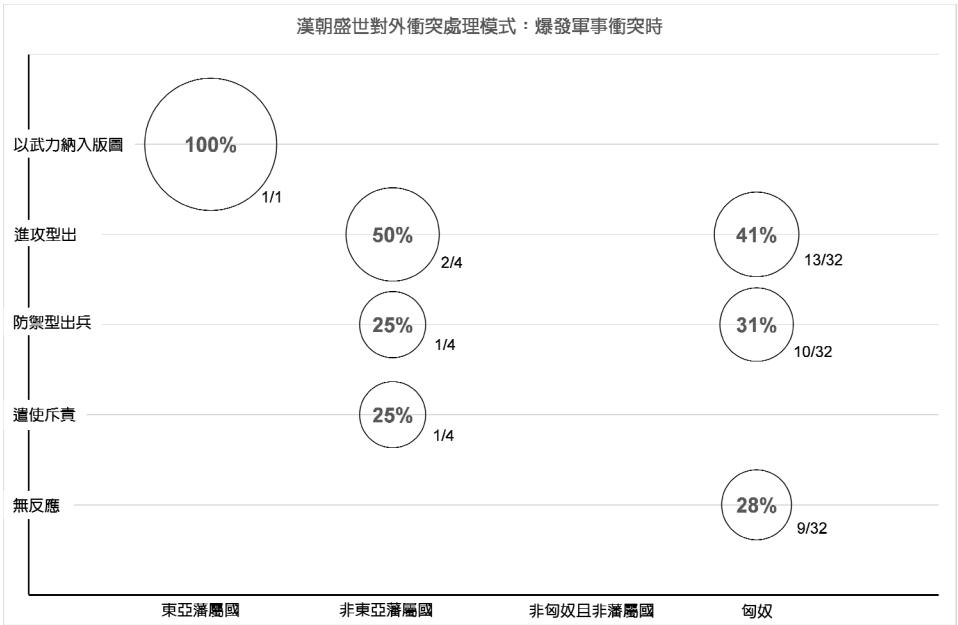
而當面對來自「非東亞的藩屬國」以及「主要敵國」的攻擊時，漢唐兩代則是有約 5 成的機率會派兵進入其領地進行攻擊。相較於面對「東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藩屬國」的軍事行動時，漢唐兩朝均相當果斷地派出軍隊，不但是進入該國境內進行攻擊，更將其直接納入版圖或是平定叛亂主力，這個反制的力道更強大一些。

簡單總結當對手國主動挑起「軍事衝突」的情形底下，處於盛世時期漢唐兩代的回應：一、中原王朝顯然無法忍受來自「東亞藩屬國」的軍事挑戰，百分之百會出兵迎戰，甚至不惜消滅對方的主力或將對手國直接納入版圖；二、當同樣面對來自其他對手國的軍事攻擊時，中原王朝的反應強度會是：「東亞藩屬國」大於其餘類型的對手國，其中，漢朝的反應強度是：「東亞藩屬國」大於「非東亞的藩屬國」再大於「主要敵國（匈奴）」，唐朝面對軍事攻擊時的反應強度則是：「東亞藩屬國」大於其他類型的對手國（其餘階層排序不甚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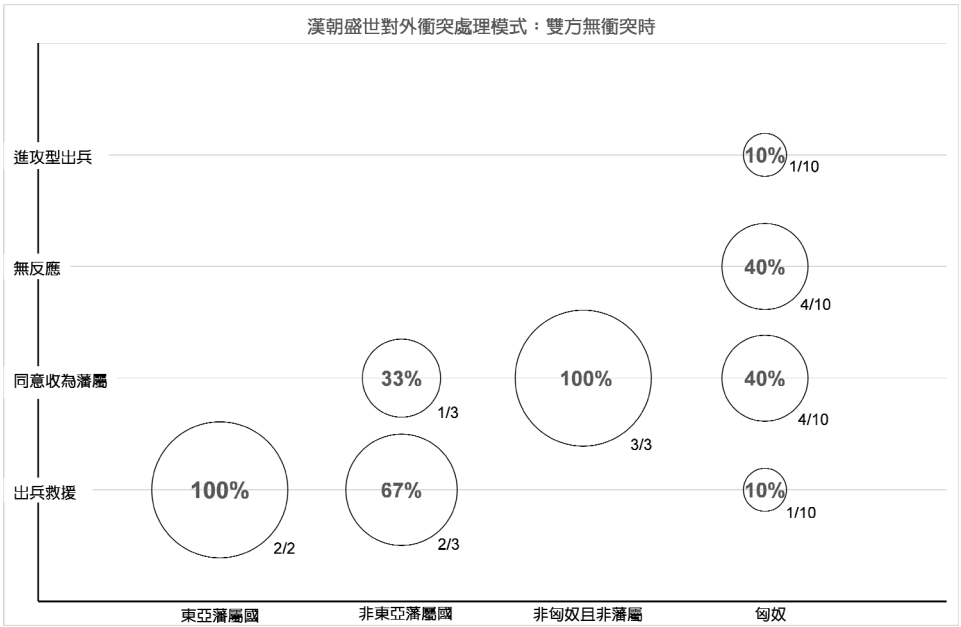
**圖 8　盛世漢朝對外衝突處理模式（出現危害體系衝突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9　盛世唐朝對外衝突處理模式（出現危害體系衝突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緊接著是當對手國主動挑起「危害體系衝突」的情形底下，中原王朝的回應。這種情況包括了：不禮敬中原使臣（如態度傲慢、言語恐嚇、囚禁使臣等屬之）；接納或援助反叛中原王朝的勢力（包括叛將、叛臣或是反叛的藩屬國等）；與中原王朝的主要敵國交好（包括建立臣屬關係或是聯合出兵等）；攻擊其他藩屬國；殺害使臣；對手國試圖脫離體系（諸如不遵從宗藩體系擅自迎立新主、宣稱不奉中原王朝爲上國等）；以他國爲上國甚至是自行稱帝與中原王朝並立等，可能動搖以中原王朝爲上國的宗藩體系的行爲均屬之。

同樣地在上圖中，X 軸越往左表示對手國在親疏關係的光譜中與中原王朝關係越緊密。Y 軸越靠近原點代表漢朝的反應越緩和甚至是消極不回應。首先看到漢朝的部分，基本上來說，漢朝當面對與對手國爆發危害體系衝突的情況下，回應的強硬程度是依循著「東亞藩屬國」高於「非東亞藩屬國」高於「非主要敵國且非藩屬國」高於「主要敵國」的標準模式，唯一的例外是「非匈奴且非藩屬國」的這個部分，這個群組的對手國遭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高比例的「以武力併入版圖」以及「以武力收歸藩屬」，與其它群組佔比高出許多，分別達到 29%，究其原因乃在這類型的對手國在漢朝時期，都曾經「多次劫殺漢使」，史書中均並未將每次單一事件始末詳細列出以便納入統計，而這些國家「多次劫殺漢使」最後遭到漢朝強硬回應前，漢朝對這些國家屢屢劫殺漢使的行爲並未加以回應，相信若將這些無回應的數據納入統計中，也會大幅增加圖中「無回應」的佔比。具史料紀載同樣是多次擊殺漢使的國家有：滇、勞深、靡莫、大宛與龜茲（蕭焯，2017），其中，滇國和大宛國被漢朝以武力收歸爲藩屬國，比重是 29%，而勞深、靡莫兩國也因多次殺害漢朝使臣，遭受漢朝出兵攻擊並以武力滅國納入版圖，佔比爲 29%。「多次劫殺漢使」而漢朝面對龜茲國的多次劫殺漢使，並未加以回應，至於大宛國，則是在其多次劫殺漢使之後，漢朝選擇對其發兵進攻以示懲戒。

其次是唐朝的回應。唐朝面對與對手國爆發危害體系衝突時，唐朝回應的強硬程度大致上仍依循著「東亞藩屬國」高於「非東亞藩屬國」高於「非主要敵國且非藩屬國」高於「主要敵國」的標準模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亞藩屬國」的高麗、新羅、百濟與高昌三國。在一次新羅國進攻百濟國故地、兩次高麗試圖脫離體系自立、一次百濟脫離體系的前提下，唐朝派遣大軍前往盪平對方的叛亂主力，佔了 21%。甚至曾以武力方式分別將新羅、百濟、高麗與高昌納爲藩屬國或納入版圖之中，在這個部分的佔比是遠高於其餘對手國。由此可見，唐朝對於「東亞藩屬國」挑釁唐朝天下體系的行爲相當難以容忍，甚至多次動員多路大軍遠征，連唐太宗都御駕親征，足見唐朝懲罰「東亞藩屬國」的力道是遠高其餘對手國。圖中另一個與理論模式不甚相符的是「非敵國且非藩屬國」的100%「無反應」，由於在本研究所選時段中，僅有一次的事件，以至於在數據上並未依循非匈奴且非藩屬國」高於「主要敵國」的標準模式。

簡單總結當對手國主動挑起「危害體系衝突」的情形底下，中原王朝的回應：一、中原王朝顯然無法忍受來自「東亞藩屬國」的挑戰由中原王朝所建構的天下秩序，選擇出兵進攻對手國甚至是「以武力納入版圖」、「以武力收歸藩屬」的比例高於其他類型的對手國；二、當同樣面對來自對手國的挑戰甚至是危害到中原王朝的天下體系時，中原王朝的反應強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是：「東亞藩屬國」大於其餘類型的對手國。

在將同樣類型的行爲以及盛世時期中原王朝的反應圖做成漢朝與唐朝的對比與整理後，不難發現幾個重點：一、當雙方無衝突時，中原王朝會對與中原王朝關係越緊密者越寬容爲懷，在對方的請求下，甚至不惜出兵襄助；二、但面對主要敵國處於相似情形時，中原王朝則可能伺機偷襲；三、當中原王朝與對方爆發衝突的前提下，中原王朝回應的強硬程度基本是依循著「東亞藩屬國」高於「非東亞藩屬國」高於「非主要敵國且非藩屬國」高於「主要敵國」的標準模式。對於關係越親近者，施以更強力度的懲罰，甚至包括併吞版圖。我們將上述發現簡單整理成模式 4 與 5：

模式 4.「盛世漢唐 vs 藩屬國」: 無挑戰時，極和善；面對挑戰極強硬。

模式 5.「盛世漢唐 vs 敵國」: 直面衝突，主要以進擊面對衝突，也會伺機突襲。

根據我們對盛世漢唐的整理與比較以及模式的條列之後，可以看到盛世漢唐時期的衝突處理模式均相當程度的驗證我們所提出的假設 2 及 2.1 與 2.2，即當國力鼎盛，中國（漢唐）會因爲了維繫天下秩序，面對挑戰時會根據挑戰來源國不同而做出不同反應，越親近者反應越強烈，而當對手國並未做出挑戰時，爲維繫天下秩序中原王朝會極力保護與拉攏親近者，也會伺機攻擊可能破壞天下體系的敵人。這樣的一種對衝突的處理模式，相當近似於中國人人際關係中的親疏遠近的區別，是呈現著一種同心圓的樣態，足見一旦中原王朝具備一定國力時，面對外來挑戰中原王朝的回應方式，關係名分便是中原王朝首要考量。

## 三、新生與盛世時期綜合比較

前面我們分別比較與整理了，漢唐中國分別在新生以及強盛時期對各種不同類型國家衝突因應，在這裡，我們試著將四大不同類型的國家根據親疏關係簡化成爲兩類，分別是敵國以及藩屬國，將國力強弱分爲新生以及強盛，在國力較弱的新生時期再依其國力分爲新生漢朝以及國力稍強的新生唐朝，簡單根據其決策特色製成表 1。在表中清楚可見在無挑戰的前提下，盛世漢唐與新生漢唐對藩屬國都相當和善，而在對方主動挑起衝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前提下，中原王朝的反應，最爲激烈是「盛世漢唐 vs 藩屬國」程度遠勝於居次的「盛世漢唐 vs 敵國」。

**表 1　漢唐中國「衝突－回應」決策模式**

| 關係親疏 / 國力強弱 | 與漢唐中國關係較疏遠 | 與漢唐中國關係較親近 |
|---|---|---|
| 弱 → 新生 | 「新生漢朝 vs 敵國」：<br>姑息型扈從，<br>以和親與避戰方式面對衝突 | 「新生漢唐 vs 藩屬國」：<br>無挑戰時，較和善；<br>面對挑戰，反應並不激烈 |
| | 「新生唐朝 vs 敵國」：<br>抗衡型，<br>主要以防禦面對衝突，也會伺機突襲 | |
| 強 → 強盛 | 「盛世漢唐 vs 敵國」：<br>直面衝突，<br>主要以進擊面對衝突，也會伺機突襲 | 「盛世漢唐 vs 藩屬國」：<br>無挑戰時，極和善；<br>面對挑戰，極強硬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 肆、結論

本文關注在中國歷史上興起的統一王朝：漢與唐兩朝面對來自周邊國家衝突時的回應，並根據史實歸納出一個可資依循的大國「衝突－回應」決策路徑。詳言之，本文試圖找出的是當中國統一王朝（漢、唐）面對外來挑戰時，是否願意以動武的方式來予以解決？或者是以外交的方式調解？若是動武，又是甚麼程度的用兵策略？甚麼因素是影響中國統一王朝（漢、唐）反應強弱的關鍵。簡單來說，是大國（統一且強盛）面對來自周邊的挑戰時，大國如何抉擇動武與否。

首先依據國力強弱將漢唐兩代區分爲新生時期與盛世時期，分別檢視新生漢朝、盛世漢朝、新生唐朝以及盛世唐朝這四個時段的中國，當與其他國家發衝突時的起因、過程與中國面對衝突的處理方式，並透過將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對手國以「親疏遠近」（名分秩序）爲分類標準，據此梳理出漢唐中國的外在衝突處理模式，分別是：

1. 「新生漢唐 vs 藩屬國」：無挑戰時，較和善；面對挑戰時反應並不激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新生漢朝 vs 敵國」：姑息型扈從，以和親與避戰方式面對衝突。
3.「新生唐朝 vs 敵國」：抗衡型，主要以防禦面對衝突，也會伺機突襲。
4.「盛世漢唐 vs 藩屬國」：無挑戰時，極和善；面對挑戰極強硬。
5.「盛世漢唐 vs 敵國」：直面衝突，主要以進擊面對衝突，也會伺機突襲。

並進而驗證了我們所提出的假設，包括：當國力較弱，中國（漢唐）面對外來挑戰會以國家存續考量爲優先，面對高度外在威脅時，中國會試圖採取抗衡策略迎接挑戰。若抗衡不可能，則轉爲扈從或避險策略。另一方面，當國力逐漸強盛後，由於維繫政權存續的需求已得到基本滿足，因而其對外戰略將更多地與理念性的變項相聯繫。詳言之，中國（漢唐）面對外來挑戰會根據挑戰來源國與中原王朝關係的親疏遠近而做出不同反應，越親近者反應越強烈，而當對手國並未做出挑戰時，爲維繫天下秩序中原王朝會極力保護與拉攏親近者，也會伺機攻擊可能破壞天下體系的敵人。

在文中，我們從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體系出發，對儒家和平論做了延伸與修改，首先檢討了權力轉移理論過多關注大國而忽略小國的行爲對政體大國戰略所造成的影響，且作爲崛起國的漢唐無論是在國力急起直追時或是取代既存霸權之後，都並未主動對既存霸權做出過多的挑戰行爲，而是基本遵循著守勢現實主義的預期。另一方面，本研究指出當中原王朝處於強盛時期時，當中原王朝未受挑戰的情況下，的確會對關係越緊密者給予越多的支持和援助，甚至不惜派兵相助，中原王朝並不會在未受挑戰的前提下，因自身國力提升而主動試圖去併吞鄰國，但假若中原王朝受到來自關係越緊密者的挑戰時，中原王朝會因憤怒而對關係緊密者施予最強硬的回擊，然而若此一挑戰是來自關係較爲疏遠者，中原王朝對其回擊便不會如此強烈。此一論點，既挑戰了儒家和平論中儒家世界較爲和平的定論，指出儒家文明內部的衝突可能遠強於儒家與其他文明的衝突。本文透過歸整漢朝與唐朝初期與盛世時期的「衝突－回應」決策路徑找出一個試圖結合物質與理念、符合中國歷史文化的解釋途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將焦點放在大國興起過程中面對衝突的回應模式，如此，既避免攻勢現實主義以及權力轉移理論過度注重大國行爲以及強調國家能力的誤區，同時也突顯一旦儒家文化圈內出現衝突時中國的態度，並將朝貢體系理論與關係理論相互結合並加以衍伸，進而完善歷史中國的「衝突－回應」決策模式。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部分

王日華，2011，〈孔子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外交〉，《現代國際關係》，5: 47-54。Wang, Ri-hua. 2011. “Kongzi zhuyi guoji guanxi lilun yu zhongguo waijiao” [Confucian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ese Diplomacy].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 47-54.

王日華，2016，〈崛起國與霸權國無直接戰爭的根源〉，《國際政治科學》，1(2): 37-73。Wang, Ri-hua. 2011. “jueqiguo yu baquanguo wu zhijie zhanzheng de genyuan” [Non-direct Wars between Rising Powers and Hegemonic Pow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2): 37-73.

王貞平，2020，《多極亞洲中的唐朝》，上海：上海文化出版。Wang, Zhen-ping. 2020. *Duoji yajhou jhong di tangchao* [*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 Shanghai: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石之瑜，2020，〈國際關係中的「關係」理論與「後華性」實踐〉，《東南亞研究》，3: 1-17。Shih, Chih-yu. 2020. “Guoji guanxi zhong de guanxi lilun yu houhuaxing shijian” [Arguing Rela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Agenda of Post-Chinesenes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 1-17.

何友暉、彭泗清、趙志裕，2007，《世道人心：對中國人心理的探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He, You-hui, Si-qing Peng, & Zhi-yu Zhao. 2007. *Shihdao rensin: duei jhongguoren sinli de tansuo* [*The Worl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Psycholog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吳玉山，2010，〈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包宗和（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頁 389-415。Wu, Yu-Shan. 2010. “Quanli zhuanyi lilun: beiju yuya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Predicting Tragedy?]. In *Guoji guanxi lilu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 Bau, Tzong-ho. Taipei: Wunan, 389-4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　彬，2009，〈墨子的國家間政治思想研究〉，《國際政治科學》，18: 61-87。Li, Bin. 2009. “Mozi de guojiajian zhengzhi sixiang yanjiu” [A Study of Mozi’s Inter-state Political Thought].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8: 61-87.

林　幹，1986，《匈奴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Lin, Gan. 1986. *Xiongnu tongshi* [*History of the Hun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林恩顯，1988，《突厥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Lin, En-shean. 1988. *Tujue yanjiu* [*Turkic Studi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徐　進，2009，〈孟子的國家間政治思想及啓示〉，《世界經濟與政治》，1: 6-16。Xu, Jin. 2009. “Mengzi de guojiajian zhengzhi sixiang ji qishi”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of Mencius and Its Implications].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 6-16.

時殷弘，2011，〈武裝的中國：千年戰略傳統及其外交意蘊〉，《世界經濟與政治》，6: 4-33。Shi, Yin-hong. 2011. “Wuzhuang de China: qiannian zhanlue chuantong jiqi waijiao yiyun” [China in Arms: The Millennial Strategic Traditions and Their Diplomatic Implications].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6: 4-33.

張　鋒，2012，〈中國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清華路徑〉，《國際政治科學》，32: 125-156。Zhang, Feng. 2012. “China guoji guansi yanjioujhong di cinghua lujing” [The Tsinghua Approach in China’s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2: 125-156.

張啓雄，2013，〈東西國際秩序原理的差異－「藩屬體系」對「殖民體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9: 47-86。Chang, Chi-hsiung. 2013. “Dong xi guoji zhixu yuanli de chayi- fanshu tixi dui zhimin tixi” [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Suzerainty vs. Colonizati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79: 47-86.

張榮芳、黃淼章，1991，《南越國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Zhang, Rongfang & Miao-zhang Huang. 1991. *Nanyue guoshih* [*History of the Nanyue Kingdom*].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陳康令，2015a，〈傳統東亞秩序的歷史演進與禮制穩定－以「塔形結構」的建構發展爲例〉，《國際關係研究》，5: 22-38。Chen, Kang-lin. 2015a. “Chuantong dongya zhixu di lishi yanjin yu lizhi wending- yi taxing jiegou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e jiangou fazhan weili"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Rule by Etiquette of the Traditional East Asian Order - A Case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ower Struc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 22-38.

陳康令，2015b，〈試析傳統東亞秩序『禮治下的和平』〉，《國際觀察》，(4): 73-86。Chen, Kang-lin. 2015b. "Shixi chuantong dongya zhixu lizhixia de heping" [Traditional East Asian Order: "Peace under Pax Li"]. *International Review* 4: 73-86.

黃光國，1998，〈中國人的人情關係〉，文崇一、蕭新煌（編），《中國人：觀念與行爲》，臺北：巨流，頁 43-69。Hwang, Kwang-kuo. 1998. "China ren de renqing guanxi" [Chinese Human Relationships]. In *China ren: guan nian yu xingwei* [*The Chinese: Ideas and Behavior*], eds. Wen, Chung-I &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Taipei: Chuliu Book Co., LTD., 43-69.

黃囇莉，2006，《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臺北：揚智。Huang, Li-li. 2006. *Renji hexie yu chongtu: bentuhua de lilun yu yanjiu* [*Interpersonal Harmony and Conflict: A Localized Theory and Study*]. Taipei: Yang-Chih Book Co., Ltd.

楊中芳，2001，《如何理解中國人》，臺北：遠流。Yang, Chong-fang. 2001. *Ruhe lijie China ren* [*Understanding Chinese People*].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劉學銚，2019，《突厥汗國》，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Liu, Xueyao. 2019. *Tujue hanguo* [*Turk*]. Xi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鄭端耀，2003，〈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42(2): 1-21。Cheng, Tuan-Y. 2003. "Guoji guanxi gong shi yu shoushi xianshi zhuyi lilun zhengbian zhi pingxi"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Defensive vs. Offensive Realism]. *Issues and Studies* 42(2): 1-21.

蕭　焯，2017，《西域簡史》，海南：南海出版社。Xiao, Zhuo. 2017. *Siyu jianshi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Hai kou: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 二、西文部分

Andreski, S. 1968.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ravel, T. 2005.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ina's Compromises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2): 46-83.

Jervis, R.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167-214.

Kang, D. 2003.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 57-85.

Kang, D. 2007.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elly, R. 2012. "A 'Confucian Long Peace' in Pre-Western 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 (3): 407-430.

Mearsheimer,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Nathan, A. & R. Ross.1997.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Norton.

Organski, A. F. K. & J.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ganski, A. F. K. 1958.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Tammen, R. L. & J. Kugler. 2006.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1): 35-55.

Tammen, R. L., J. Kugler, D. Lemke, A. C. Stam III, M. Abdollahian, C. Alsharabti, B. Efird, & A. F. K. Organski.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

Walt, S.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ng, Yuan-kang. 2010.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

# 古籍文獻

（資料來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shiji/zh）

一、《左傳》
二、《竹書記年》
三、《史記》
四、《資治通鑑》
五、《漢書》
六、《北史》
七、《隋書》
八、《晉書》
九、《新舊唐書》
十、《南越五主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The "Challenge-Reaction" Pattern in the Rise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Chun-wei Su***

## Abstract

As unified empires in China's history, the rising Han and Tang Dynasties both maintained stable tributary systems in their surrounding areas. During these periods, they inevitably experienced various conflicts and crises with both the existing status quo hegemons which they faced upon their rise (Han Dynasty versus the Huns / Tang Dynasty versus the Turks) and with their neighbori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Han and Tang China,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unified and prosperous great powers chose their modes of reaction and the scale of forces used to deal with challenges from surrounding states.

The main argument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ise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the period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did not frequently challenge the hegemony of the status quo powers, and basically followed the expectations of defensive realism by prioritizing the security of their regime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Han and Tang Empires were in their prosperous eras, once there was a challenge from a vassal state, the "Central Kingdom" would impose the severest punishment on those vassal states which failed to abide by their duties within the hegemonic order.

This differs from the theme of Confucian peace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at relative peace exists within the Confucian cultural circle. In actuality, the intensit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untries within this order may even be far stronger tha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nfucianist civilization and other

* DOI:10.6166/TJPS.202306_(96).0002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mail: junewei9@mail.ntp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ivilization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China maintains a tough attitude toward the countries that it is closest with in the event of conflict. By combining and extending the tributary system theory and the "guanxi" theory,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reaction" decision-making pattern in historical China.

**Keywords:** Guanxi, Vassal State, Han Dynasty, Tang Dynasty, Rise of China, Chinese World Order, Conflict Resolution Mode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